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财政建设和改革

靳继东

(东北财经大学,大连 116025)

内容提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实践命题。财政建设和改革在中国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了基础性、制度性和支撑性作用,也承担着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使命。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制度属性和实现形式,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和独特内涵,强调国家制度及治理效能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财政建设实践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建设和改革提供理论思考和实践指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能力 财政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4)03-0043-10

一、引言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历史 and 实践中开辟的一条现代化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中逐步呈现和日益清晰的,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些共同趋势和形式特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必然在特定的历史 and 实践中形成道路、制度和理论的本质特征和独特内涵。

在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比较视野中把握 and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独特内涵,这个命题本身意味着:国家是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主体,也是研究和思考现代化模式的分析主体。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是否能采取适合自身制度形式 and 政策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and 制约着推进现代化的最终效果。换言之,国家制度及其有效推进现代化的能力是理解一个国家成功推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在成功推

[收稿日期]2024-02-18

[作者简介]靳继东,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 and 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研究”(17BZZ068)。

进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有利于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完善和治理效能提升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形塑着自身的制度和实践形态。把握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建设和改革与国家能力及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是我们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和独特内涵的重要维度。为此,本文拟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制度属性和实现形式,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和独特内涵,强调国家制度及其有效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因素,并通过阐释财政建设和改革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建设提供理论思考和实践指向。

二、一般性与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吉尔伯特·罗兹曼,2003)。历史的共同趋势和现代社会在形式上的共同特征,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推进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作为人类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在中国的独特实现形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在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中逐步形成、日益成熟的,同时也必然在初始条件、制度约束和实践道路等诸因素约束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内涵。

(一)一般趋势和特殊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显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属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后来者”,从而具有后现代化国家在推进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共同特征。比如,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构成现代化“后来者”推

进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后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历史环境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与现代化的“先行者”相比,后现代化国家和地区不仅在历史遗产、发展基础等初始条件上极为不同,而且更加显著地处于尚未完成的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顺利和成功推进现代化进程,基本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选择和 国家能力的挑战更加关键。“它们往往不是在经济 发展中建立和完善政治制度,而是先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以推进现代化进程”(钱乘旦、陈意新,1987)。中国的独特性在于“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形式和道路的特殊影响”(罗荣渠,1993),而社会革命之所以在分析中国现代化背景中值得格外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于民族和世界历史具有非凡的意义,而且还在于它所带来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变迁模式”(西达·斯考切波,2007),尤其是中国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政权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

从制度前提来看,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和道路选择上选择了社会主义,从而为近代以来谋求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确立了有效的制度条件。这种制度前提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推进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具备了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一些共同制度特征。比如,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化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体系尤其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形成强大的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资源动员、汲取和配置能力,在相对薄弱的发展基础上采取“赶超型战略”谋求更快地推进现代化;在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时序上集中精力推进工业化发展战略,在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

从实践道路来看,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改革探索,这也是当时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上的类似之处。但是,中国的独特性,一方面在于采取了渐进性市场化改革策略,而不是最终导致苏联、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失败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策略;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市场化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始终坚持市场经济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正确方向,并且在改革探索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从而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为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

对于后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而言,选择走向现代化道路并不必然等于能够顺利实现现代化,选择何种制度、采取何种战略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方式和途径可能更加关键。“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最鲜明特点是:政治制度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钱乘旦、陈意新,1987)。对于近代以来谋求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而言,只有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近代以来就谋求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才真正开始。“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亨廷顿,1989)。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整合以及推进经济社会变革等多重目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同时面对和解决的共时性问题,这种并联式的现代化历史要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首要

革命任务是推翻旧有的、衰败的、难以推动甚至日益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制度体系,创建一个有利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和强有力政府。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成功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后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重大发展,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为推进和实现现代化创造了基本的制度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提供基本制度条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重要保障,二者之间这种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恰恰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重要的历史逻辑和制度特征。基于这种现代化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关系,邓小平(1993,1994)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不搞现代化……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过去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进一步明确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样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形成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制度保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历史发展方位,以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判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指导方向。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实现方式

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两者都统一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尽管在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国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基本制度、发展道路有着历史的一致性、继承性,但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环境、形势挑战、阶段特征以及推进手段等诸多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采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新的实践道路。

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并且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历史和实践,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我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历史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不必也不应该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予以破解,从而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制度优势。究其根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更快地推进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目标和根本战略。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高位阶的历史命题出发,在深刻总结计划经济时期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样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从而为形成和开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现代化建

设新的实践路径奠定了认识基础。二是坚持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坚持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治方向和定位,运用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优势来驾驭和发展市场经济。世界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繁荣与国家的富强,只能在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并根据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程度来评价其最终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显然,以社会主义制度驾驭和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和重要经验。三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特别是推深入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较长历史周期中,根据阶段性改革任务和矛盾关系,相机抉择和推进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转换,正确应对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和格局的深刻调整 and 变化,在不断突破改革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深层次矛盾的同时又能够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既是学者们在理论上未曾预见到的,也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没能成功解决的。四是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认识,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强调更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加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在实践中探索和破解政府和市场关系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综上,我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推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历史的开创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特征和独特内涵

谋求以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经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长期探索,在改革开放后开创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特别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和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独特内涵等理论认识也更加深化和成熟。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的本质和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本质特征和价值内涵: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毫无疑问,推进和实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和一贯的历史方向,但只有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开创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历史内涵。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条件下成功推进的现代化道路,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特征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提升制度效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价值。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坚持将市场经济改革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始终坚持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以国家能力驾驭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服务现代化建设,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重,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价值。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征是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以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

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为目标体系的新的现代化。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价值是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推进现代化道路,能够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新的现代化方案。

三、财政建设和改革在探索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独特贡献

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国家显然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主体。从理论上总结和探究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共同特征,国家自然成为非常重要的分析对象。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及制度效能,既是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也更加突出地表现在后现代化国家和地区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不仅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需要应对不断出现和日益突出的社会变迁、结构分化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而且还由于,后发展国家在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现较快增长和适应现代化导致的更为集中、剧烈的变迁过程,对国家能力及制度效能提出了更加强硬的要求。尽管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制度效能的因素可能是多维度、多面向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对资源的动员、汲取以及管理能力和制度安排构成了国家能力和制度效能的基础。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作为我国国家建设关键制度要素的政党及其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为中国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领导核心和根本政治保障。国家的制度属性和制度能力不仅是中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征。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巨大、持续历史更长、具有更大规模的后现代化国家,特别是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大国而

言,形成现代化所需要的国家资源动员、汲取和配置能力的要求必然更加突出,这对作为资源动员、汲取和配置基础性制度的财政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一) 财政建设为形成和建立现代化所需要的国家资源汲取和配置能力提供了制度基础

形成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能够有效地解决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动员、汲取和配置能力。与西方国家在更长历史周期内渐进增长的现代化资本需求相比,中国这样的后现代化国家要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迅速启动现代化建设,对资本的需求无疑更加迫切,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建立更加强大的资源动员、汲取和配置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需求与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相对匮乏的资源条件之间的突出矛盾,我国建立中央政府主导下的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从而为形成强大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加快实现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换的资源支撑能力奠定了制度基础。这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形成的国家汲取和配置能力的财政制度,不仅通过资源动员和汲取能力有效地解决了作为现代化“后来者”必将面对的资本形成这一战略性问题,而且在根本上确立了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战略和阶段性需求而进行财政资源汲取和配置方式的实践取向。根据这一取向,计划经济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集中全社会资源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选择,在改革开放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同样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的历史变革,就必然导致财政功能、范围和作用方式等深刻变化,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但是,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

转换背景下财政功能、范围和作用方式等形式上的变化,本质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财政在本源上作为国家资源汲取和配置手段的根本定位和作用,而只是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不同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上对财政汲取和配置方式上的要求。因此,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以动员和集中全社会资源为工业化提供根本财力保障,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建设,将财政资源更多地用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公共服务和着力保障民生,还是新时代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都根本上体现了财政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资源汲取和配置的制度功能。

(二) 财政改革实践增强了更为集中、剧烈的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制度弹性

就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言,“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问题和要求的制度结构”(艾森斯塔德,1998)。这就要求,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应该形成和保持应对大规模经济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调整的制度弹性,或者说能够形成和保持根据变革而持续调整的制度包容性。这种现代化过程中特有的制度弹性或包容性要求,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方面,要求制度自身必须具有快速现代化所要求的适应性变革能力。现代化是个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带来深刻的利益关系和结构的变化,作为利益关系和结构急剧变化所要求的制度安排,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制度自身也必须相应地具有容纳和规范这些利益关系和结构,以及因利益关系和结构变化可能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改革成本的适应性能力,即

制度应对利益分化和整合的弹性或包容性；另一方面，还必须形成持续推进和深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对整个现代化进程方向、阶段和步骤的掌控能力，同时还必须提供能够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动力，也就是制度自身适应性调节和变革的弹性或包容性。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中的基础制度，其自身改革实践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制度弹性上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一是充分发挥财政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性作用，承担各种不同经济体制转化导致的制度成本、改革成本和稳定成本，为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和保障。二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坚持预算、税收和立法等重大财政权限始终归于中央政府，保持中央在国家财力总体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提供重要保障。三是通过财政分权化使地方财政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最终形成了以“发挥两个积极性”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央地财政体制机制，为地方政府谋求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体制激励。

（三）财政改革实践保障了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内生动力和正确方向

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背景而言，既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国家丧失资源汲取和配置能力而导致现代化衰败的历史教训，也有1949年以后通过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源汲取和管理能力而迅速推进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同样也面临着充分实现资源配置优化而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提供足够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的现实需求。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变化和实践要求，国家在对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和方式的安排上是有显著差异的。改革开放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全面进行资源配置的主体，改革开放后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既

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提供更有效率的动力，同时也强调运用包括公共资源配置等在内的政策手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实现国家对现代化方向的保障、对现代化过程的驾驭，为持续的现代化提供改革动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实现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像西方市场经济形态那样在长历史周期中自然演进和形成的，而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定条件下展开的。基于这种历史条件和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不仅决定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必须依次解决市场机制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破题，从积极培育壮大市场机制的范围、领域和深度，到不断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避免无序市场带来的负面后果等过程特征，而且要求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等本质特征。按照这个特殊过程和本质特征的要求，财政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既面临着适应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实践要求，从而实现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功能、范围和作用方式的深刻变化，还承担着推进市场化改革、为改革提供体制动力和引导市场运行等重要作用。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和最终结果来看，无论在改革初期财政让利做减法以刺激和培育体制外市场机制，还是通过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和保障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在推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重作用发挥、实现发展成果为全民所共享、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关系，既强调向地方、市场分权从而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又强调驾驭市场、避免单纯市场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等诸领域，都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四）财政建设和改革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

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通过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的经验和启示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现代化提供了核心力量;坚持和发展以这种政党—国家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为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和根本动力;以保障中央政府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核心建构强大的国家能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实现形式,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重;追求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价值体系,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不仅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基础性、制度性和保障性作用,而且通过财政改革实践和国家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作用发挥,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命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和中心任务。在不断推进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我国财政的制度安排及实践运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深刻地嵌入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政治经济过程,围绕着服务和支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根本历史主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建设道路、制度和理论的政治本质。二是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制度要求,在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和实践形态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以统收统支为主要特征的财

政体制为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国家资源汲取和资源支撑,还是改革开放后通过财政体制改革不断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改革动力和制度激励,都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和实践道路。这种两个不同历史时期财政体制机制的改革调整和财政功能定位的深度变革,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对财政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必然要求,也反过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三是坚持推进和深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安排提供实践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革中,注重建立健全发挥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财政自主权并强调地方财政责、权、利的结合,另一方面坚持既通过财政责权利下放充分保障为地方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又始终坚持重大财政权限始终归于中央政府,为确保中央政府权威、形成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区域平衡发展保障能力,以及实现共同富裕、优化收入分配、支持创新驱动等重大国家战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央地财政关系和政府市场关系的制度演进特征和建设经验。四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实践过程坚持贯彻着中央向地方纵向分权、政府向市场横向放权的双重趋向。既通过向地方放权从而调动和发挥地方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又通过保障地方财力和规范地方财政行为推动地方政府向市场主体放权,从而为推进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进一步理顺,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两个优势,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资源配置格局,在根本上为解放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财政责任和使命

新时代,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成为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既包括经济基础即“物”的现代化,又包括上层建筑即“制度”的现代化,还包括实践主体即“人”的现代化。财政是服务实现国家战略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和保障,应该也必须承担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赋予的重大使命。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政治本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是引领现代化方向、驾驭现代化过程、为现代化提供体制动力的政治保障,也是财政建设、改革和发展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障。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全面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财政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方向。

(二)坚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下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必然包括推进国家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和方式的现代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口数量巨大、持续历史更长、具有超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客观事实没有发生改变,大规模经济变革、深层次社会结构和利益调整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政经形势对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的挑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现代财政制度

建设要根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围绕保障和支撑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国家能力建设,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机制改革,以优化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地方财政能力可持续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为重点方向,着力推进税收分享体系改革、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改革、分类转移支付改革、横向政府间事权合作改革、跨年度预算平衡与中期预算规划试点、地方债改革等试点改革,科学谋划和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财政体制改革对重大改革的牵动性作用,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和体制动力。

(三)在坚持高质量发展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财政作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制度,必须紧紧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国家主体的资源汲取和配置本源功能,准确把握财政作为国家资源配置政策工具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性手段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作用,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实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的政策实施,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

(四)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财政建设和改革要坚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总量和结构,目标和过程,效率和公平,市场、政府和社会等重大关系。重点是充分发挥财政保障功能,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财政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优化财政运行机制提升人民物质生活需要保障能力;财政保障能力在空间上平衡布局,促进区域、城乡、群体的协调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发挥财政在初次分配中的

专题策划：财政与中国式现代化

牵引作用,促进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充分发挥财政在二次分配中的基础性政策手段作用,促进财富分配在区域、阶层和城乡之间实现相对均衡,有效发挥财政在三次分配中的激励作用,鼓励全社会慈善、捐赠等事业发展;不断提高财政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完善财政支持社会保障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扩大民生保障的覆盖面和细分领域,补齐民生短板,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增强人民群众从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求是,2023(8).
- [2]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3]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5]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杰,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
- [6]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
- [9]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J].求是,2014(1).
- [10] 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张旅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王东伟】

(上接第42页)

判断预算方向,预算的安排要能够引导预期,进而化解风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

参考文献:

- [1] 韩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N].人民日报,2022-11-01(003).
- [2] 黄新华,赵瑶.政治过程与预算改革[J].财经问题研究,2014(12):72-78.
- [3] 李俊生,姚东旻.互联网搜索服务的性质与其市场供给方式初探——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6(08):1-15.
- [4] 刘尚希.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3(05):23-31+91.
- [5] 吕冰洋,曾傅雯,涂海洋,等.中国财政可持续性分析:研究框架与综合判断[J].管理世界,2024,40(01):1-20.
- [6] 吴兆莘.国家预算底本质和职能[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02):105-122.
-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9]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N].人民日报,2023-03-16(002).
- [10] 肖鹏,王亚琪,2003a.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3(06):23-30.
- [11] 肖鹏,王亚琪,2003b.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精神解读[J].财政监督,(04):13-16.
- [12] 叶振鹏,张馨.二元结构财政——中国财政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 [13] BUITER, W. H. A 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 and deficits[J]. Economic Policy,1985,1(1),13-61.

【责任编辑 王东伟】